

庆祝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成立六十周年专题

六十年风雨同舟 新征程砥砺前行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成立六十周年志庆

中国社科院拉美所课题组

内容提要：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也迎来了成立60周年这一重要时刻。本文是拉美所课题组撰写的一篇基于学术发展史的回顾和总结。60年来，拉美所风雨兼程，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这一进程中，拉美所学术发展的内涵和方向呈现为四个鲜明的特点：与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相适应，与中国发展阶段相同步，与中拉关系的发展相配合，与拉美发展相伴随。中国的伟大实践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为我国拉美学术研究提供了新机遇、新要求。经过60年的不懈努力，拉美所的科研已经从自发探索转向自觉构建新时期的拉美研究范式，不断激发问题导向与推动理论创新的学术研究活力，巩固了历史与逻辑、现实与理论相统一的学术研究框架，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体系作出了积极贡献，为解决中国重大现实问题和服务于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智力支持。着眼未来，拉美所将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继续坚守责任，坚持质量导向，开拓创新，再创辉煌，不负使命。

关键词：拉丁美洲研究所 六十周年 问题导向 理论创新 学术体系 智力支持

课题组成员：柴瑜 王荣军 袁东振 刘维广 周志伟 孙洪波 张勇 林华 王鹏 郑猛 肖宇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1) 03-0001-33

时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也迎来成立60周年这个重要的日子。60年来，拉美所同仁风雨兼程，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院党组和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拉美所在“三大体系”建设、人才培养、智库作用的发挥、对外学术交流、体制机制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本文是拉美所课题组撰写的一篇基于学术发展史的视角回顾和总结文章，旨在系统梳理拉美所建所60年来致力于拉美研究事业所作出的学术贡献及学术发展特点，以此向建所60周年这个重要的纪念活动献礼。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强调的，“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拉美所的拉美研究事业以及个人的学术追求无不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发展阶段的演进以及中拉关系的跨越式发展息息相关。当前，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站在新阶段的起点，拉美所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基于中国高质量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新要求，自觉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到研究所工作的各个领域和全过程，努力开创拉美学术研究的新局面，继续攀登学术研究的新高峰。

一 紧跟时代步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对应

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会影响其认知世界的视角、方向和内容。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变化显著，成为撬动国际体系变革的核心要素之一。作为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拉美所的研究轨迹与中国国际地位变迁有着紧密的逻辑关联。

（一）中国国际地位的变迁

从历史视角分析，根据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参与程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际地位大致呈现以下脉络。

1. 第一阶段（“冷战”时期）：国际反殖、反帝、反霸的引领国。新中国诞生于全球“冷战”初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探索阶段，中国在经济民生、外交工作上都面临严峻挑战，与包括拉美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多处在两极对立的“夹缝”地带。在这种局面下，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对推进反殖、反帝、反霸斗争发挥了引领作用。比如，中国明确声

援古巴、巴拿马、多米尼加等国反对美国入侵与干涉的斗争，支持加勒比国家独立。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建立广泛的反帝、反殖、反霸统一战线”依然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思路。1974年，中国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其核心要义就在于中国的“第三世界”身份定位以及“建立国际反霸阵线”的政策逻辑，中国支持拉美争取200海里海洋权、支持巴拿马收回运河区主权都是具有标志性的外交实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尽管外交政策的侧重点有所调整，但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依然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而中国在推动南南合作、南北对话中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2. 第二阶段（“冷战”结束到21世纪初）：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参与国。“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提速，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进入高速推进阶段，全面融入国际体系成为中国外交的显著特征。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2000年，“走出去”战略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中国与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体系进入深度融合互动阶段。另外，随着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国际体系转型加速推进，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在内的新兴大国更加广泛地参与到全球规则的制定之中。2005年，中国与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等新兴大国受邀参与“G8+5”峰会；2008年，中国参加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这也是中国“入世”后首次参与WTO核心层谈判；同年，二十国集团升级为讨论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参与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传统模式形成巨大冲击；2010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中，中国份额占比从3.996%升至6.394%，排名从第6位跃居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因此，通过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深度参与，中国在释放自身发展潜力的同时，既强化了包括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等合作机制的建设，也提升了在国际规则体系中的话语权。

3. 第三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主导力量。自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作为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实现了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引领的转变，并成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主导力量。特别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坚持和平发展理念的同时，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捍卫多边主义，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积极履行“负责任大国”义务，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尤其像“一带一路”倡议、丝路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亚投行等一系列中国方案，均体现了中国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公正合理方向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也已经成为包括拉美在内的发展中地区深化国际合作的优先对象。

（二）中国国际地位变迁下的拉美所研究选题

20世纪50年代末，受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指示，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联合推动下，拉美所于1961年7月4日经中央批准正式成立。建所60年来，拉美所的研究始终紧扣时代主题，遵循学术研究规律，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走出了与中国国际地位变化同步的拉美研究探索路径。

1. 第一阶段：从“革命范式”向“发展导向”转变

拉美所诞生于全球“冷战”阶段，“革命范式”是拉美所早期研究的显著特征。

建所初期，“革命”“反帝”“反独裁”“反美斗争”是该阶段成果中的高频词汇，涉及内容主要包括：帝国主义对拉美的控制与渗透、拉美武装斗争、拉美左派运动及其主张。其中，尤其关注美国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控制、军事渗透、文化侵略，以及拉美国家反美斗争的情况。另外，由于中国当时处在农村土地改革的推进阶段，拉美国家土地制度也是研究的重要议题，体现了拉美所“借鉴拉美经验”的研究思路。比如，1963年完成《大庄园制的特点和土地问题》，1965年对厄瓜多尔、巴西、哥伦比亚、阿根廷等国的土地制度进行了案例剖析。难能可贵的是，尽管研究工作刚刚起步，但拉美所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中央多个部委交办的研究课题，比如《卡斯特罗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墨西哥的外国资本》《美国对拉丁美洲的侵略和掠夺》《战后拉丁美洲国家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和奴役的斗争》等，这些对策研究为党和国家争取拉美进步力量，开拓在拉美的外交局面，建立广泛的反殖、反帝、反霸阵线提供了智力支持。

进入20世纪80年代，拉美所明确了“加强基础研究、以动态为主”的研究思路，课题设置更注重理论性、专业性、系统性和应用性。既对拉美外债危机、马岛战争、中美洲危机、民主化进程、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等热点事件进行了分析，也针对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问题对标拉美，借鉴拉美的经

验教训，服务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对外开放事业。特别是，拉美所强化了对拉美问题的理论解读，提出了诸如“拉美民主化进程不会逆转”“80年代初拉美出现的经济危机是结构性危机”“战后拉美与外部经济之间不是单纯的依附性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①等学术观点，还系统解释了“拉美国家工业化的战略选择”和“战后拉美国家外交理论和政策实践”^②。其中，《开放的拉美与中国的开放》^③一文立意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拉美研究中的“发展导向”视角。此外，拉美所还出版了一批基础性研究著作，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政治》《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和《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④等著作成为年轻学者及研究生入门拉美研究的必读书目。

拉美民族革命运动仍是20世纪80年代拉美所研究的重要内容。有学者指出，战后拉丁美洲的反帝反霸反殖斗争在继续巩固政治独立的同时，进一步向经济领域深入发展^⑤。也有学者认为“争取经济独立并以经济独立来巩固政治独立”是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重大目标^⑥。此外，一些研究从国别和次区域案例的视角论述了大国在拉美的竞争，如有学者从萨尔瓦多政变分析美苏博弈，从巴拿马运河危机分析美国的霸权干涉政策^⑦。这些研究为中国开展对拉外交尤其是在南北对话、南南合作中团结拉美国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第二阶段：研究方法与分析视角的突破

“冷战”结束初期，中拉双方都处在改革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阶段，“国际新格局对拉美意味着什么”“拉美参与全球化的表征”以及“中拉合作如何对接”成为拉美所研究的新课题。有学者强调应加强包括拉美研究在内的地区研究，赶上世界学术研究趋势^⑧。此后，拉美所的学术研究在专业

① 李在芹：《试论拉丁美洲政治进程的发展》，载《拉丁美洲丛刊》，1985年第4期；徐世澄：《拉美经济危机是结构性危机》，载《拉丁美洲研究》，1987年第4期；卢后盾：《拉丁美洲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载《拉丁美洲研究》，1987年第2期。

② 苏振兴：《拉美国家工业化的战略选择》，载《拉丁美洲研究》，1989年第3期；肖枫：《论战后拉美国家外交理论和政策的发展》，载《拉丁美洲研究》，1989年第2期。

③ 肖枫：《开放的拉美与中国的开放》，载《拉丁美洲研究》1986年第1期。

④ 关达、祝文驰等编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苏振兴、徐文渊主编：《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沙丁、杨典求、焦震衡、孙桂荣著：《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⑤ 苏振兴、徐世澄：《战后拉丁美洲的反帝反霸反殖斗争》，载《拉丁美洲丛刊》，1982年第5期。

⑥ 李在芹：《争取经济独立是拉美民族解放运动重大目标》，载《拉丁美洲丛刊》，1984年第2期。

⑦ 杨西：《从萨尔瓦多看苏美争夺》，载《拉丁美洲丛刊》，1982年第2期，第21页。

⑧ 李慎之：《加强地区研究，赶上世界学术研究趋势——〈剑桥拉丁美洲史〉中文版序言》，载《拉丁美洲研究》，1991年第1期。

性和系统性方面都有所突破,学术产出实现“跨越式”增长,学术争鸣气氛活跃,相关研究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范畴处于领先水平。

第一,研究议题多维扩展,全球视角、比较研究成为亮点。首先,拉美所针对特殊历史节点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延续了从历史维度研究拉美的学术传统。涉及的历史节点包括“哥伦布首航美洲500周年”“古巴革命胜利40周年”“巴西历史500年”“何塞·马蒂150诞辰周年”“切·格瓦拉诞辰80周年”等。其次,多学科解读拓宽了议题维度。“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拉美国家处于不断变革调整时期,拉美所的研究基本实现了对所有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的全覆盖。涉及议题包括中美洲和平进程、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北美自由贸易区、拉美地区一体化、墨西哥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动荡、阿根廷经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对拉美的影响、古巴改革、拉美民众主义、拉美左翼崛起与社会主义思潮、拉美社会保障改革,等等。通过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深度和系统性显著提升。再次,全球视角和比较研究成为新亮点。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拉美所一批学者从全球体系的视角分析了拉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国拉美学界的研究视角创新^①。最后,比较研究也有了明显加强,尤其是针对拉美与东亚发展模式的比较,拉美所一些学者开展了持续的跟踪研究^②。

第二,学术争鸣氛围热烈,相关研究属国内领先水平。拉美所具有学术争鸣的优良传统,这是拉美所保持学术活力、持续学术精进的关键因素。随着学术关注趋于广泛,拉美所学术争鸣氛围也更热烈。比如,针对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美国的“美洲倡议”、拉美21世纪初的“粉红浪潮”、拉美现代化等议题,拉美所在加强学术研究的同时,积极与国内外同行展开对话,深化了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认知。针对一些重大选题,拉美所推出了一系列学术精品,相关研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例如,《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墨西哥政治模式的历史考察》一书是国内较早探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学术成果;《发展模式与社会冲突》一书深入探讨了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对发展中国家

^① 徐世澄:《世界格局的变化对拉丁美洲的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1991年第1期;江时学:《世界格局变化对拉美经济的利弊》,载《拉丁美洲研究》,1991年第5期;陈芝芸、杨茂春:《世界经济新格局中的墨西哥》,载《拉丁美洲研究》,1992年第1期;宋晓平:《经济全球化与拉美国家国际参与的启示》,载《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6期;吴国平著:《全球金融危机:挑战与选择》,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

^② 江时学著:《拉美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江时学、李明德著:《现代化: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的发展模式研究具有很强的启发价值；《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问题研究》一书则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分析对拉美政治、经济、社会等深层次问题进行了剖析^①。

3. 第三阶段：前瞻性和战略性研究的强化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实现了从以往被动的“跟随者”向新秩序“塑造者”的转变，这给国际问题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拉美研究而言，完成对“拉美是怎样的研究对象”的问题解释已不能完全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前瞻性和战略性研究尤其显得重要。为回应国家与社会的多层次需求，拉美所与时俱进，做出了很多有益探索。

第一，强化了对拉美发展趋势的前瞻性研究。拉美所对拉美地区或国别政治、经济、外交进行了系列前瞻性研判，针对全球百年大变局在拉美地区的体现做出了理论分析和趋势展望^②，针对拉美重点国家、产业的发展潜力进行了前瞻性研究^③，为全面客观把握拉美发展趋势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第二，更多关注对策规划性研究。服务中拉关系是拉美研究的重要目标，为进一步发挥“智囊团”的作用，拉美所进行了很多学术探索与尝试，推出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学术作品。有学者从经济增长趋势、贸易、劳动力资源等层面分析中拉经贸合作的潜力^④，也有学者从全球治理、软实力、文明对话、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命运共同体等角度探索中拉之间深化合作的可能性和可行性^⑤，还

^① 曾昭耀著：《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墨西哥政治模式的历史考察》，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苏振兴、袁东振著：《发展模式与社会冲突》，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袁东振主编：《拉美国家的可治理性问题研究》，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

^② 袁东振：《拉美政治生态的新变化与基本趋势分析》，载《国际论坛》，2019年第3期；孙洪波：《拉美地区局部动荡：表现、根源及前景》，载《当代世界》，2020年第8期；谢文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拉关系》，载《人民论坛》，2020年第2期。

^③ 贺双荣：《巴西现代化进程与国际战略选择》，载《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5期；周志伟著：《巴西崛起与世界格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吴国平、王飞：《浅析巴西崛起及其国际战略选择》，载《拉丁美洲研究》，2015年第1期；张勇：《后危机时代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与展望》，载《国际经济论坛》，2020年第3期。

^④ 柴瑜、王效云：《自贸协定中投资自由化水平评价——基于哥伦比亚三个主要自贸协定的研究》，载《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2期；岳云霞：《中拉经贸合作潜力与环境研究》，载《拉丁美洲研究》，2013年第2期；贺双荣：《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拉合作》，载《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2期。

^⑤ 谌园庭：《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中拉合作——机遇南南合作的视角》，载《拉丁美洲研究》，2015年第6期；贺双荣：《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必要性、可能性及挑战》，载《拉丁美洲研究》，2016年第4期；郭存海：《中拉文明对话：意义、目标、路径和机制》，载《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4期；张凡：《跨区域交流与中拉整体合作——兼论中国在拉美的软实力构建》，载《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5期。

有学者从多个视角出发综合探讨中国对拉美的战略思路^①。这些研究不仅进一步拓宽了学术分析视野，而且为党和国家对拉决策提供了智力支持，不少研究结论和建议体现在中国对拉政策文件之中。

第三，战略研究成为新关注点。大国关系是贯穿国际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研究的主线，拉美所在过去10年间围绕“大国与拉美关系”和“大国在拉美竞争”进行了系统分析，部分成果得到了中央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有学者对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对拉美战略进行了系统评析，厘清了相关大国在拉美的利益选项、政策目标及手段^②；也有学者分析了中美拉三角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为应对中美在拉美的竞争局面做了有益的思考^③；还有学者针对中国对拉美战略作了系统分析，明确了影响要素、战略目标与路径^④。发展问题是中拉双方的共同议程，也受到了拉美所学者的长期关注。在过去10年里，拉美所的一些学者从“中等收入陷阱”着手，根据拉美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避免发展困境的应对策略^⑤。

二 应对现实诉求，与中国发展阶段相同步

中国与拉美国家同属发展中经济体，都面临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提升人民福祉等一系列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以来多年经济封锁的环境下，实施以赶超战略为主导的经济自主发展模式。随后中国逐步实现了完整工业体系、经济大国、全面小康等阶段目标，正向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进。而在上述进程中，拉美所的学术研究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同步，为解决中国发展诉求和探索发展道路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经验和教训。

（一）中国发展阶段之划分

在经济发展学说史上，工业化思想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术脉络，数百年

① 吴白乙：《全球化与“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中拉发展战略对接》，载《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6期；吴白乙等著：《转型中的机遇：中拉合作前景的多视角分析》，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第4期；吴白乙、刘维广主编：《结构性转型与中拉关系前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② 孙洪波：《英帝国在拉美：经济霸权与外交策略》，载《拉丁美洲研究》，2014年第6期；王鹏：《美国对拉美政策的缘起及其启示》，载《拉丁美洲研究》，2014年第6期；杨建民：《试论美国对拉美的新战略：“美洲增长”倡议》，载《学术探索》，2020年第9期。

③ 周志伟：《如何看待中美拉三角关系中的两组结构性矛盾》，载《当代世界》，2018年第4期。

④ 贺双荣：《新时代中国对拉美的战略及其影响因素》，载《拉丁美洲研究》，2019年第6期；张凡：《中拉关系及中国对拉战略研究的一种进路：进展与问题》，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1期。

⑤ 郑秉文主编：《中等收入陷阱：来自拉丁美洲的案例研究》，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2年。

来引领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工业发展成果被视为中国增长奇迹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以工业化推进作为手段，密切联系着增长动力与增长实现，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传导逻辑。因此，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刻画着中国发展的各阶段特征。

1. 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蓄力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经济千疮百孔。伴随 1953 年“一五”计划的实施，中国工业化进程正式拉开序幕。在以“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为主要基调的要求下，中国工业在负重中艰难发展，逐步建立了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未来工业化快速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探索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制度的改革，中国工业化发展日益深入，经济建设进入快车道。改革开放起步阶段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进一步调整中国工业和经济发展结构，二是积极探索中国工业与经济各项保障制度。在制度摸索改革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向是关键。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市场化”的方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但在随后 10 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如国企间“三角债务”、通货膨胀、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问题。

3. 加入 WTO 后的工业化加速期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成功融入全球市场。2002 年，中共十六大向世界宣布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适时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从工业化发展角度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即由原有的粗放式增长逐步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集约式增长的重大转变。同时在入世推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下，中国丰裕的劳动力资源结合大量外国资本进入形成了更具生产效率的要素配置，以“外需为主，内需为辅”的需求驱动效应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对外贸易成为一个重要的增长引擎。中国工业化进程得以加速发展，于 2010 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家，并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着推进城镇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防范经济不确定性、加强对外经贸合作等内外部发展诉求问题。

4. 步入新时代后的工业化换挡期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拉开了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序

幕，其主要矛盾也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深刻改变，“人口红利”正逐步消退。这意味着解决当前主要矛盾需要将过去单纯依靠“数量”扩张改为提高发展“质量”的新思路。同时，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低迷不振，外部需求萎靡，以出口和投资驱动为主已向依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转型。工业化进程也相应在过去加速推进的基础上伴随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进入换挡期，即由过去传统制造业向高科技制造业升级。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为应对世界复杂深刻的变化、经济缓慢复苏与发展分化、国际经贸格局调整以及各国依然严峻的发展问题提供了创新的解决方案。倡议体现出中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坚定决心，以及中国制造“走出去”，分享优质产能、共商项目投资、共建基础设施的使命。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化、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中国积极加强与各地区、国家间的经贸联系，充分发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势，保障其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完整，为工业化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内外部环境。由此，步入后工业化进程的中国经济正呈现出向内产业升级、向外产能转移的时代特征。

（二）研究方向与中国发展阶段相同步

与中国发展阶段相同步，拉美所的研究方向在各时期均侧重聚焦中国发展诉求，旨在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困惑提供可借鉴的经验与教训。与中国发展阶段相对应，拉美所的研究工作也经历了蓄力—探索—加速—深化拓展的发展路径。

1. 工业化蓄力期的拉美研究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蓄力期，拉美所的研究聚焦历史与现状相结合，主要涵盖拉美基本国情、独立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等问题^①。受战后国内经济恢复、国际环境恶化以及学术积累不足、研究人员规模有限等各种因素制约，在实现“从无到有”的开创阶段中，拉美所研究工作主要偏重于整理文献和收集资料，研究领域相对狭窄。随着国内经济和国际政治环境趋好，拉美所恢复工作，队伍建设和科研工作迅速展开，20世纪70年代末组织编辑出版了《拉丁美洲手册》和《拉丁美洲各国政党》等著作，并创办了学术期刊《拉丁美洲丛刊》（1986年更名为《拉丁美洲研究》）。

^① 徐世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对拉丁美洲的研究》，载《拉丁美洲研究》，1998年第6期。

2. 工业化探索期的拉美研究

这一时期正值世界各国战后 30 年恢复调整基本完成，在拉美民族经济日益壮大、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已初具规模、自主性逐步加强的背景下，总结并评价拉美经济结构（或称发展战略）调整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热点。结合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挑战，拉美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拉美各国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通货膨胀、债务和金融问题等。

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困境，都与工业化战略本身密切相关^①。发展主义强调工业化是发展的关键，主张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经济结构变革和国民经济现代化，改变拉美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地位。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导致拉美债务负担过重、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并使经济活力衰竭，经济增长难以持续^②。具体分析其原因：其一，拉美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忽视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仅片面发展工业，未从根本上摆脱单一经济的畸形结构，受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和剥削，过分依赖国际市场，模仿西方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成为实现经济独立的障碍，也是易受外部冲击的重要原因^③。其二，拉美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入被动，就因为不适当地追求高速度。而经济过热往往导致通货膨胀、外债激增、国际收支失衡、各产业部门难以协调配合、基础设施滞后等多重矛盾并发，致使经济出现剧烈波动^④。为应对上述发展问题，拉美从国内经济运行机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程度两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一方面减少或消除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增强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摒弃保守的对外经济政策，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充分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市场。具体如抑制严重通货膨胀，改革对外贸易和金融部门管理体制，整顿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等做法对于同期中国改革调整，实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更好结合提供了有益借鉴。

3. 工业化加速期的拉美研究

2001 年中国成功入世标志着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在充分吸收跨国资本和学习先进技术的利好下，经济发展也基本完成了 20 多年的改革探

^① 苏振兴：《拉美国家工业化的战略选择》，载《拉丁美洲研究》，1989 年第 3 期。

^② 吴国平：《试论 80 年代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载《拉丁美洲研究》，1992 年第 5 期；曾昭耀：《有关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评价中的几个问题》，载《拉丁美洲研究》，1999 年第 3 期。

^③ 徐宝华：《八十年代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载《世界经济》，1986 年第 3 期；安建国：《八十年代的拉美经济危机与发展战略调整》，载《世界经济》，1986 年第 8 期。

^④ 卢韦、史敏：《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出路》，载《世界经济》，1992 年第 10 期。

索，工业化进程在“开放红利”不断释放的基础上进一步得以推进。在延续前一阶段对拉美经济改革、发展模式等研究侧重的同时^①，拉美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现实性进一步增强。

进入21世纪后，拉美所学者继续将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作为重点关注的研究课题之一。有学者深入考察了改革的预期和实际成效，认为新自由主义并未促进拉美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反而使拉美国家接连发生危机^②。在全球化第二次浪潮中，如何兼顾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则成为当时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的战略考虑。有研究认为，资本项目开放是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其进程必须与本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要重视汇率的作用，保持充足的国际储备，实施资本管制措施，强化本国金融体系的竞争力^③。伴随资源配置超越民族国家的范围，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中拉关系也随之步入重要发展机遇期，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涉及评估双边自贸协定、中拉经贸关系以及拉美一体化等^④。在拉美社会领域，有学者指出，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有效防止可能出现的各种“城市病”，既要防止“过度城市化”，更要纠正“浅度城市化”^⑤；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拉美在社会保障等方面制定多项政策，但总体上政策的分层化、排斥性、非公正性和局限性影响了收入再分配功能的发挥^⑥。

4. 工业化换挡期的拉美研究

近10年来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使其增长模式由增量向提质转变。同时，

① 苏振兴：《改革与发展失调——对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整体评估》，载《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6期。

② 徐世澄：《拉美学者对“后新自由主义”和“新发展主义”的探索》，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

③ 江时学：《拉美国家开放资本项目的经验教训》，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年第1期。

④ 《发展中巴经贸合作对策建议》课题组、郑秉文：《进一步加强中国和巴西经贸合作的对策建议》，载《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2期；柴瑜：《拉美国家的贸易开放度研究》，载《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4期；杨志敏：《拉美国家参与世界多边贸易体制进程浅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3期；谢文泽：《美洲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潜在影响》，载《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1期；周志伟：《当前拉美一体化现状及陷入困境的原因》，载《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5期。

⑤ 郑秉文：《拉美城市化的教训与中国城市化的问题——“过度城市化”与“浅度城市化”的比较》，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7期。

⑥ 房连泉：《社会分化、贫富差距与社会保障——拉美国家福利体制变革的经验教训》，载《拉丁美洲研究》，2008年第2期；高庆波：《阿根廷与中国养老金制度改革比较》，载《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5期；齐传钧：《拉美私有化养老金制度扩面困境、措施与启示》，载《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4期。

伴随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地位的提升，来自外部竞争和内部转型的压力与日俱增。2008年和2016年发布的两份《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和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作用下，作为中拉合作的一大支柱，中拉经贸关系进一步加深，极大促进了双方在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产能合作、区域一体化等领域的合作。为了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外部竞争以及解决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产能过剩等突出问题，拉美所的研究方向也将重点转向新时期中拉合作，研究领域更加丰富和多元化。

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下，中国对外贸易近年来的结构性调整加速，未来中国对外贸易有望继续实现数量与质量并进，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晋级。在此期间，中拉现有的3个自由贸易协定运行良好，正推动着中拉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①。一些学者围绕《中国—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官方联合可行性研究》项目主题完成了系列研究成果^②。

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拉丁美洲能否与中国协同发展，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新旧动能转换及中拉合作结构、能力不对称所带来的挑战取决于中拉发展战略对接推进程度^③。这就需要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针对拉美变局适当调整政策思路，制定合作规划，创新合作机制，打造合作平台，促进中拉合作走深走实，争取“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取得早期收获^④，具体做法如提速升级中拉资金融通合作，加快拉美金融公共产品支持体系建设，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金融公共产品提供机制，促进中拉绿色贸易，开展与拉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投资合作，落实与贯彻“五通”，推进

① 柴瑜、岳云霞、张伯伟等：《“中国—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研究》，载《拉丁美洲研究》，2012年第4期；岳云霞、吴陈锐：《中智自贸协定贸易效应评价——基于引力模型的事后分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14年第6期。

② 岳云霞、阎馨月：《哥伦比亚服务贸易开放度及其对中哥自贸协定的启示——基于4项自贸协定的比较分析》，载《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柴瑜、郑猛：《拉美自贸协定中贸易便利化水平测度——以哥伦比亚为例》，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岳云霞、赵晨阳：《拉美自贸协定中贸易限制研究：以哥伦比亚为例》，载《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3期。

③ 吴白乙：《全球化与“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中拉发展战略对接》，载《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6期。

④ 贺双荣、王钰鑫：《中智携手打造新时代中拉“一带一路”的合作典范》，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5期。

国家中心城市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①。

此外，针对研究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议题如区域一体化、工业化、效率与公平、反贫困等，以及对中拉关系的回顾、全球治理、软实力构建、“双循环”等近期热门话题的研究也为中国近10年经济发展解决开放、可持续发展、减贫、大国外交等问题提供了思路^②。

总之，拉美研究与40余年的中国开放之路相生相伴，研究内容随着中国发展诉求的增加更加趋向多元，研究方法更加丰富和灵活，在资料收集的基础上引入案例研究、比较研究以及实证研究等。拉美研究不断拓展研究广度和深度，创新研究方法，极大提升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边际效用，为中国经济发展在处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工业化与农业发展、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机制、利用外资与提高国内储蓄率、发挥本国资源比较优势和改善产业结构等相互关系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解决方案，也为当前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掘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市场和资源尤其是加强中拉合作提供了智力支持。

三 把握合作趋向，与中拉关系相配合

拉美所成立60年来高度重视中拉关系研究，一直将中拉关系作为科研主攻方向之一。中拉关系在我国外交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开启对拉美民间交往，七八十年代迎来中拉建交两次高潮，90年代中拉关系进入建立长期稳定关系阶段。21世纪初，中拉关系向“跨越式”发展阶段迈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拉关系进入推动整体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拉美所紧扣中拉关系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分析了中拉关系发展的历史逻辑、

^① 王飞：《区域性公共产品与中拉“一带一路”金融合作》，载《区域与全球发展》，2020年第2期；史沛然：《“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拉绿色产品贸易：特征、比较优势与出口潜力》，载《企业经济》，2021年第1期；芦思姮：《拉美基础设施问题与中拉合作》，载《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0期。

^② 张勇：《后危机时代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与展望》，载《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3期；柴瑜、王效云、丁宁：《拉美国家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进展与观念趋向》，载《国际展望》，2016年第5期；郑猛、田永晓：《拉美六国要素替代弹性与收入分配研究》，载《拉丁美洲研究》，2019年第2期；谢文泽：《改革开放40年中拉关系回顾与思考》，载《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1期；张凡：《中拉关系的问题领域及其阶段性特征——再议中国在拉美的软实力构建》，载《拉丁美洲研究》，2019年第3期。

事实特征和未来发展趋势，其学术思想观点主要如下。

（一）中拉关系呈现“累积—跨越式”发展特点

中拉关系经历了艰辛开拓、长期积累、稳步发展的过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要重视中拉关系发展的基本经验^①。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国际地位上升，中拉双方共同的“发展利益”进一步凸显，相互合作的愿望和能力进一步增强。

第一，中拉关系发展动力由政治驱动转向经贸驱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开启对拉美民间外交，历经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两次建交高潮，从长期“累积”稳步推进到 21 世纪初“跨越式”发展，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渠道和官民并举的发展新局面，中拉关系呈现出特有的“累积—跨越式”发展特点^②。基于中拉双方发展关系的主要动力，即政治驱动为主阶段（1949—2001 年），经贸驱动为主阶段（2002—2012 年）和战略引领、多擎驱动阶段（2013 年以来），中拉关系经过了从点到面、从基础性到战略性、从无足轻重到不可或缺的发展历程^③。在“跨越式”发展阶段，中拉各自的比较优势通过扩大合作而获得更好的发挥；彼此可以把对方作为市场多元化选择的重要对象；经贸合作规模的扩大带动了合作链条的延伸和合作领域的拓展；双方为保护共同利益，加强在国际领域的多边合作更为迫切。

第二，中拉在彼此外交中的战略地位上升。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中拉双方利益融合点不断增多，彼此提升了对对方在外交全局中的战略定位^④。一是中拉关系的地缘格局更趋平衡。中国与拉美多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或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拉关系发展的国别地缘格局日趋平衡，不仅提升了中国把握拉美外交全局的能力，而且增强了中国对拉美外交在地缘上的灵活性。二是发展利益成为中拉关系中的重中之重。中国经济的增长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对拉美的不可替代性，中国在拉美的核心利益日趋转变为中国在拉美的“常规利益”，而“发展利益”正上升为中拉关系中的“重中之重”。三是拉美国家始终在对华关系中以追求经贸合作的实际利益为重点，并把中国看作对外

^① 苏振兴：《中拉关系如何面向未来》，载《拉丁美洲研究》2009 年增刊 2。

^② 郑秉文、孙洪波、岳云霞：《中国与拉美关系 60 年：总结与思考》，载《拉丁美洲研究》，2009 年增刊 2。

^③ 谌园庭：《中拉关系 70 年回顾与前瞻：从无足轻重到不可或缺》，载《拉丁美洲研究》，2019 年第 6 期。

^④ 郑秉文、孙洪波、岳云霞：《中国与拉美关系 60 年：总结与思考》，载《拉丁美洲研究》，2009 年增刊 2。

经贸关系多元化的战略选择。“发展利益”完全符合中拉双方的发展逻辑，是中拉双方共同追求的战略核心和实现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四是中拉关系进入战略引领、多擎驱动阶段，可称之为“构建发展”阶段^①。战略引领表现为中拉关系的全局性和战略性日益凸显，双方政府主动从战略高度规划彼此关系的发展；多擎驱动表现为推动中拉关系发展的动力向着政治、经贸、社会、人文、国际协作、安全领域及整体合作方式全面发展，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战略合作格局。五是中美拉之间长期存在三角互动关系。中拉关系的发展是一种双边关系的发展，但美国因素的介入使之被动地成为一种三角互动，美国政府把中拉关系的发展放到中美关系的大框架中进行考量，美国的态度和政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对中国政策的取向，而且将影响中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②。

第三，中国是中拉关系“构建发展”阶段的主要推动力量。当前中拉关系正从“跨越式”发展阶段向“构建发展”的新阶段过渡。“构建发展”关系的内涵包括以规划未来中拉关系新格局、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为战略目标，以构建新的中拉合作框架和模式为战略路径，以协商共赢、不针对第三方为合作原则^③。进入“构建发展”阶段的中拉关系在政治、经济、人文交流和多边合作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中拉贸易实现“三级跳”，贸易、投资、金融合作全面展开，中拉双边关系形成多层次、多元化大格局。2013年以来为第三阶段，整体合作是主线，主要成就包括中拉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中拉经贸合作跨入“金融驱动”阶段，中拉开始对接“一带一路”^④。由于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中国经济转型具有复杂性且拉美转型道路艰难，中拉合作仍面临诸多挑战。中国与拉美要顺利推动转型时代的战略关系，有三对主要矛盾需要解决：一是合作机制的逐步完善与预期成果之间的差距，二是中国持续的战略投入与拉美国家承接能力之间的矛盾，三是双方对发展关系的迫切需要与相互认知的显著欠缺^⑤。因此双方不仅要从战略高度对中拉关系未来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向和合作路径进行构建和规划，还需构建和塑

① 谌园庭：《中拉关系70年回顾与前瞻：从无足轻重到不可或缺》，载《拉丁美洲研究》，2019年第6期。

② 魏红霞、杨志敏：《中拉关系的发展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从美国政策的角度分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6期。

③ 赵重阳、谌园庭：《进入“构建发展”阶段的中拉关系》，载《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5期。

④ 谢文泽：《改革开放40年中拉关系回顾与思考》，载《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1期。

⑤ 赵重阳、谌园庭：《进入“构建发展”阶段的中拉关系》，载《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5期。

造同属中拉人民的价值观和认知理念。

（二）拉美是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可或缺的地区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从全球视野和全球利益角度对拉美进行重新定位和战略布局，拉美成为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可或缺的一个地区^①。

第一，整体合作开辟中拉友好合作新纪元。中拉双方在外交战略调整的过程中产生了加强全面务实合作共识，双方在多边层面的合作利益和战略需求不断增长，整体合作日益上升为彼此政策新的关切和重点。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双方整体合作正式进入机制化阶段，开辟了中拉友好合作的新纪元^②。中拉论坛的建立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是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33 个国家全面合作的新起点、新平台，而且标志着中国实现了同发展中国家整体合作机制的全方位覆盖^③。中拉论坛构建的整体合作新平台主要体现在以下显著特征：合作对象的整体性、互利性、平等性、目标一致性、内容全面性及合作方式的灵活性。基于对拉共体各成员国差异性的认识，中拉整体合作机制采取以“多边”和“双边”互相促进、互为补充的“双轮驱动”策略，各方可以在中拉论坛及相关领域分论坛框架内，共同商定重点合作领域和合作项目，开展形式多样的务实合作，从而使中拉整体合作与中国和拉共体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合作并行不悖，实现优势互补。中拉整体合作意味着拉美地区进程与中拉关系演变出现交集，但整体合作应定位为中拉“全面合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未来发展方向，其路径与全面合作的“立体”模式有别，其成败取决于拉美国家协调、统一步伐，但不妨碍双方全面合作的持续展开^④。中拉整体合作将在拉美充分利用外部条件追求自主与发展的诉求中探索前行之路，但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国别差异等带来的挑战以及制度和地区主义逻辑的不同也会制约整体合作的顺利发展。

第二，中拉关系立体化发展成为“金字塔”构造图景。未来中拉关系将呈现为立体化发展的一个“金字塔”构造图景，以政治、外交、经贸、安全、

^① 贺双荣：《新时代中国对拉美的战略及其影响因素》，载《拉丁美洲研究》，2019年第6期。

^② 周志伟、岳云霞：《中拉整体合作：发展逻辑、现实动力与未来方向》，载吴白乙、刘维广主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4～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29页。

^③ 吴白乙：《中拉论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的风景线》，载《求是》，2015年第3期。

^④ 张凡：《拉美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中拉整体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年第2期。

人文等方面的多层次制度架构作为基本保障^①。一是中拉关系的发展向全球治理领域延伸，具有更大的全球性影响；二是中拉之间不存在结构性冲突或政治、安全困境，友好合作一直是中拉关系的主旋律，中拉合作不断深化且向更多领域拓展；三是伴随全球力量对比、国际格局和体系复杂调整，中拉双方利益、观念和身份亦将持续调整；四是拉美基于其地域空间、自然禀赋和文化开放性与发展多样性等诸多特征，将继续为中国提供战略性支撑，也是中国推进全球大国外交的最佳试验场；五是在全球各种力量多重合作或博弈中，中拉双方将开展更加密切的合作，在涉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等议题上的共同诉求进一步增强，既加大拉美国家对中国在维护发展中世界普遍权益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也增加了中国外交在拉美地区日益平衡、广泛的地缘政治资源^②。中拉关系处于全球体系转型期，需要关注其新旧矛盾的合作管控、权力转移的“软着陆”和新型价值体系、制度规范化、地区性合作网络与超国家行为体的形成。考察中国对外战略机遇期拉美的地位和作用，就经贸、金融、能源、社会治理、安全和外交等领域，系统评估拉美国家对华合作状态、成因和潜力^③。

第三，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十八大以来推动建立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的新实践，也是实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实践^④。以新时代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紧扣中拉务实合作诸多领域，研究新时期推进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方向和路径，界定新时期中拉关系进入“构建发展”的新阶段，主要特点是从“反应式”向“主动筹划型”转变^⑤。拉美国家普遍认可和接受“中拉命运共同体”方案，认为中国是拉美可信、可靠、平等的“中心”伙伴^⑥。21世纪初，中拉经贸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双方利益日益融合，中拉初步建成互为发展机遇的命运共同体；随着中拉经贸关系发展及人员交流扩大，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影响中拉双方的共同安全问题；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以及全球挑战的不断

① 吴白乙主编：《转型中的机遇：中拉合作前景的多视角分析》，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

② 张凡：《中拉关系及中国对拉战略研究的一种进路：进展与问题》，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1期。

③ 吴白乙主编：《转型中的机遇：中拉合作前景的多视角分析》，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

④ 贺双荣：《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必要性、可能性及挑战》，载《拉丁美洲研究》，2016年第4期。

⑤ 吴白乙主编：《面向新时代的中拉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⑥ 谢文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拉关系》，载《人民论坛》，2020年第2期。

增加，使中拉双方正在成为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政治命运共同体”^①。由于中拉经济结构转型调整、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美国因素以及中拉身份认同的变化，中拉构建命运共同体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与拉美国家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

第四，中拉是全球治理改革的推动力量。中国与拉美同属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有许多共同的理念和利益诉求^②。中拉双方都认同加强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都是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的捍卫者。中拉利用多双边机制就全球治理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磋商，推动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经济贸易、金融治理等领域合作，但中拉全球治理合作机制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整体协商机制不够完善、对次地区多边机制利用尚不充分等方面^③。以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为例，这一新兴领域在治理主体、理念、主导权、具体议题及治理复杂性等问题上都不同于传统的全球治理议题。拉美国家一直积极推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进程，旨在提高该地区在网络治理进程中的话语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中拉在这一治理领域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分歧，双方对治理进程的路径和目标立场相近，寻求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同时双方在网络主权、网络治理模式等议题上存在分歧。^④

（三）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增加拉美公共产品供给

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中拉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推动拉美互联互通、区域一体化进程以及中拉合作共赢的新纽带。“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根据中拉关系发展“五位一体”新格局，中拉互联互通务实合作专题研究增多，聚焦贸易、投资、金融、网络、基建等具体领域。针对具体务实合作的功能领域，从拉美地区整体和国别两个层次，重点考察合作的重要性、路径、机制及影响因素。例如，经贸合作是中拉关系的核心内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了中拉双边金融合作，中国工业化模式的转变创造了巨大的资源和能源需求，这是中拉贸易繁荣的根本原因^⑤。

^① 贺双荣：《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必要性、可能性及挑战》，载《拉丁美洲研究》，2016年第4期。

^② 吴白乙主编：《面向新时代的中拉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③ 高波：《中国—拉美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机制探析》，载《当代世界》，2019年第10期。

^④ 赵重阳：《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拉美地区网络空间治理及中拉合作》，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6期。

^⑤ 杨建民、张勇：《当前的中拉关系特点评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13年第3期。

中拉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应对拉美“四个脆弱”内部因素，打破欧美传统“二元中心”外部桎梏，助力拉美国家走出“新发展陷阱”^①。例如，智利在拉美国家中最早表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并与中国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希望借此在拉美和亚洲之间发挥更大的桥梁作用^②。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地区，拉美与中国同步发展，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新旧动能转换及中拉合作结构、能力不对称所带来的挑战^③。

拉美加速推进以交通、能源、通信为重点领域的互联互通，这与“一带一路”的设施联通有较高的契合度，中国—拉共同体论坛是推进中拉整体合作的重要平台，中拉双方可以通过该平台，以互联互通为优先领域，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一带一路”对接与合作机制^④。铁路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也是南美洲基础设施一体化倡议的重点。规划中的巴西—秘鲁“两洋铁路”是中拉产能合作的重点项目，该项目建成后将促进拉美一体化，降低沿线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改善物流条件，降低运输成本，促进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贸易增长^⑤。

基于域外国家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中拉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基建、金融合作可弥补拉美国家发展面临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缺口^⑥。短期内，中国参与拉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能够解决当地资本不足等问题；中国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向存在国际收支逆差的拉美国家提供流动性支付工具，能够解决其金融脆弱性问题。以人民币在拉美的国际化为例，从国际货币寡占市场结构出发，以拉美地区作为人民币国际化对象区域，人民币在拉美地区流通领域的扩展不仅面临着自身竞争力的约束，从需求角度更受到拉美地区宏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汇率政策及政府治理等因素的影响^⑦。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起步阶段，中拉金融合作是扩大人民币在拉美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增强与拉美地区贸易投资联系，在拉美扩大人民币交易网络等都将促进人民币

① 谢文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拉关系》，载《人民论坛》，2020年第2期。

② 贺双荣、王钰鑫：《中智携手打造新时代中拉“一带一路”的合作典范》，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5期。

③ 吴白乙：《全球化与“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中拉发展战略对接》，载《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6期。

④ 谢文泽：《中国—拉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探析》，载《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2期。

⑤ 王飞、林紫琪：《论中国参与“两洋铁路”建设的线路规划、意义与困境》，载《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⑥ 王飞：《区域性公共产品与中拉“一带一路”金融合作》，载《区域与全球发展》，2020年第2期。

⑦ 柴瑜：《人民币国际化与拉美作为对象区域的考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

在拉美地区的国际化。长期来看，中国通过向拉美提供基础设施和金融公共产品，能够建立人民币国际化区域支点，通过更高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币计价机制，保证中国原材料的供给安全。

（四）文明对话是当前中拉关系的新范式

文化外交是中国对拉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拉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曾起到重要推动作用^①。作为中拉文化交流的载体之一，拉美文学类书籍的译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拉文化交流的特点与变化^②。在中拉相互认知层面，随着中拉交往增多，文化作为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起着重要作用^③。中拉文化外交经历了文艺外交和文明外交两个层次，随着中拉关系步入“构建发展”的新阶段，中拉文化外交上升到思想外交层次。中拉已具备进行思想外交条件：拉美国家主观上更加认同中国走自主发展道路的理念，中拉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中拉已提出构建发展未来关系的先进理念。中拉思想外交的重心是塑造中拉共识，中拉可通过完善合作机制、多元化文化外交主体、推进学术文化外交、完善文化传播体系以及加强文化产业合作等路径共塑中拉共识，并使其深入中拉双方社会，最终内化为双方民众的共同认知。^④中拉软实力的构建将愈发显现其独特的效应，既可发挥助力其他各领域合作顺利开展的工具性作用，其本身也是文明对话和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⑤。

西方媒体对拉美媒体的主导性影响和中国对外传播能力相对滞后，导致中国在拉美的形象构建尤其困难^⑥。文化产业兼具文化和经济特性，中拉双方都有发展文化产业合作的战略需要，中拉文化产业合作在塑造和提升彼此国家形象方面发挥着比政府主导的文化外交更大的作用^⑦。从文化维度分析，中拉之间在文化价值观上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存在相似之处^⑧。

① 赵重阳：《塑造中拉共识：论中国对拉美的文化外交》，载《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3期。

② 楼宇：《中拉文化交流70年：以拉美文学作品汉译为例》，载《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③ 贺双荣：《文化产业与国际形象：中拉合作的可能性——以影视产业合作为例》，载《拉丁美洲研究》，2015年第4期。

④ 赵重阳：《塑造中拉共识：论中国对拉美的文化外交》，载《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3期。

⑤ 张凡：《中拉关系的问题领域及其阶段性特征——再议中国在拉美的软实力构建》，载《拉丁美洲研究》，2019年第3期。

⑥ 郭存海：《中国的国家形象构建：拉美的视角》，载《拉丁美洲研究》，2016年第5期。

⑦ 贺双荣：《文化产业与国际形象：中拉合作的可能性——以影视产业合作为例》，载《拉丁美洲研究》，2015年第4期。

⑧ 林华：《拉美华人华侨的社会融入——基于文化维度理论的分析》，载《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中拉双方亟须加强相互认知、理解和信任，而文明对话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①。随着拉美成为“一带一路”的自然延伸和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一带一路”的框架设计及其内涵正成为推进中拉文明对话的主要动力和构建中拉文明对话机制的主要载体。文明对话是当前国际关系的新范式，中拉文明对话目标具有多层次性，即寻求尊重和包容、理解和信任、互学和互鉴，对话主体多元化和广泛化，对话路径也具有多样性。为适应世界形势和中拉关系的全新局面，以软实力构建作为未来中拉整体合作的一个重要目标和发力点，以便在维系整体合作框架可持续性的同时，助力中拉关系向更高层次迈进，以文明对话和互鉴的高度统领中拉关系走向并据此获得不竭的动力源泉。^②

四 探究思想演进，与拉美发展相伴随

拉美国家的发展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这里既是各种理论思潮的发源地，也是各种改革的实验场；这里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但又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思想文化；这里的国家有类似的历史遭遇，但在探索发展的道路上却留下了不同的足迹。拉美国家充满复杂性、曲折性的发展进程给拉美所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和源泉，促使他们深入思考、笔耕不辍。建所60年来，学者们的研究紧扣发展主题，聚焦重大问题，坚持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地区性研究与国别研究、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相结合，不断填补国内学界的研究空白，丰富和深化对拉美的认知。

（一）拉美国家的发展特点

1. 思想活跃，探索不断

拉丁美洲历来是一个思想活跃、思潮繁杂、人文气息浓厚的地区。独特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道路为各种本土理论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及源泉，而与欧美国家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使这个地区深受外来思想的影响。在形形色色的思潮中，不乏实证主义、新自由主义等舶来品，但更多的是像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解放神学、外围现实主义、21世纪社会主义等在拉美本土孕育而生、颇具拉美特色的创新思想。在拉美地区孕育产

^① 郭存海：《中拉文明对话：意义、目标、路径和机制》，载《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4期。

^② 张凡：《跨区域交流与中拉整体合作——兼论中国在拉美的软实力构建》，载《拉丁美洲研究》，2018年第5期。

生的思想理论，都在尝试着去解释或解决拉美国家遇到的各种发展难题。但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并未付诸实践，但是“拉丁美洲思想家的可贵之处在于，其思想丝毫没有因等待而退却”^①。这是拉美地区成为“思想海洋”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并不意味着拉美思想家们提出的学说主张只是天方夜谭、纸上谈兵，相反，在各种思潮的影响下，拉美国家的改革步伐从未停止，拉美俨然成为改革的实验场。思想与实践的高度融合和相互促进构成了拉美国家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特征。很多思想理论不仅成为宝贵的精神遗产，而且渗透到拉美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左右着拉美国家的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对拉美的发展战略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甚至成为治国方略。

2. 共性与个性并存

拉丁美洲作为一个非地理称谓，本身就体现出了这些国家在语言和文化上的相似性。历史上，拉美国家绝大多数都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殖民地。长达3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使得美国以南的大部分国家不仅在宗教、习俗、文化艺术等方面受到了宗主国的深刻影响，甚至在经济制度、社会结构、政治文化等方面也表现出鲜明的西葡特色。以英语、荷兰语等为官方语言的加勒比国家，在很多方面也都与拉美国家相接近。独立之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出现了考迪罗主义、民众主义、军事独裁统治、民主化浪潮、左翼政党崛起等一系列政治现象；在经济上共同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债务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初级产品出口再次繁荣等发展阶段；在社会领域，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是拉美国家共有的特征。这些相似性导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通常被视为一个整体。正因为如此，这些国家之间有着天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尽管同一性和相似性始终贯穿于拉美地区的发展历程，但各国之间的差异却又是显而易见的，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与众不同之处。正是这些特殊性造就了拉美地区的多样性，使其呈现出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图景。拉美国家之间的差异性早在殖民时期就初露端倪，不同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已经注定了每个国家不一样的命运和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国家间的差异越发明显。

共性与个性并存的局面加剧了拉美问题的复杂性。例如，经济结构相似、发展历程接近，以及同样面临市场狭小、技术落后等问题，促使拉美成为世

^① 索飒著：《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31页。

界上最早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地区，但是各国经济利益和贸易政策难以协调，阻碍了一体化的发展。最近10年以来，政治上的左右分野导致拉美的一体化进程出现碎片化的特征。再比如，20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国家都开启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但是有的国家遭遇了彻底的失败，而有的国家却取得了相对的成功。这说明，探寻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不同国家的特殊经验同等重要。

3. 从历史中寻找答案

E. 布拉德福德·伯恩斯在《简明拉丁美洲史》中写道：“历史就是现实的一部分，世界上没有任何地区像拉丁美洲那样更能说明这一点。”^①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拉美虽然只有短短500多年的历史，但却浓缩了几乎所有能够帮助人们解释和理解现实的关键，留给人们无尽的思考。为什么在富裕的土地上居住着贫苦的人民？为什么拉美的现代化道路如此曲折？为什么民众主义有着牢固的社会基础，但却在实践中屡屡受挫？为什么拉美永远摆脱不了美国的染指？……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都要从历史中去寻找。

现实是历史的发展和延续。300年的殖民史可以说是造成当代拉丁美洲一系列发展问题的根源。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很多制度最终都保留下来并得到很大程度的继承，即使经历了某些变革，也是极不彻底的。大地产制不仅是殖民时期阶级分化的经济基础，而且时至今日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土地制度，也是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症结所在。同样形成于殖民地时期的庇护关系，延伸到现代社会就成为各种腐败现象背后的政治文化因素。单一经济结构不仅贯穿于拉美的整个经济发展历程，而且与后来的初级产品出口模式有着密切的关联。“血统社会”的阴影仍然存在，提醒着人们为什么印第安人和黑人受排斥、受歧视的问题在某些国家依旧如故。

即使是研究近年来最为热门的中拉关系问题，谙熟拉美历史也是十分必要的。了解殖民史，才能理解为什么拉美国家会出现对“新殖民主义”的担忧和误解，并对错误论调予以有力的驳斥；了解拉美的文化传统，才能明白为什么中拉合作面临如此之多的“水土不服”并提出解决方案；了解发展史，才能找准中国在拉美经济变革中的定位，把握好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路径。

4. 复杂变化，曲折前行

自独立以来，发展问题一直是拉美各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作为一个经历

^① [美] E. 布拉德福德·伯恩斯、朱莉·阿·查利普著，王宁坤译：《简明拉丁美洲史——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的诠释》，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31页。

了300年殖民统治的地区来说,实现自主稳定发展、摆脱依附性和脆弱性并非易事。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拉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充满了复杂性、曲折性和特殊性。拉美国家的改革之路并不平坦,改革的效果常常不尽如人意。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拉美国家因“忽视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一味地将一种发展模式推向某种极端”^①,而难以摆脱“断裂式”转换引起的“钟摆现象”。在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拉美国家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文人执政与军事独裁的相互交替,最终迎来了政治稳定,但是从西方世界移植来的民主制度仍不成熟,并且因受到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不断显露出自身的缺陷。在社会领域,拉美国家面临着如何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挑战,社会不平等成为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拉美的的发展既有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也有共性和个性的差别;既有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关系等领域各自存在的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也有对同一重大发展问题整合不同领域知识进行分析的需求。这些都足以构成拉美所学者研究拉美发展问题的重要动力。

(二) 拉美研究:紧扣发展主题,聚焦重大问题

1. 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

拉美所建所之初,国内的拉美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拉美所学者克服重重困难,从零开始,从国情研究和动态研究入手,在短短几年内就完成了一批有关拉美基本情况的成果。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对拉美认知的进一步加深和各学科专业人才的引进,拉美所学者开始涉足基础理论研究。拉美地区丰富的思想理论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热情。他们不仅挖掘理论自身的思想内涵,还尝试用各种理论思潮来分析拉美的现实问题,形成了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并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交织的局面,且一直延续至今。

结构主义、依附论和新自由主义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经济发展理论。拉美所学者将劳尔·普雷维什的名著《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译成中文进行推介,还对结构主义理论及其实践进行深刻的剖析,将其与第三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对依附论的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点,学者们既对理论的不同流派进行分析探究,也结合拉美经济发展的实际,用这一理论来衡量拉美的依附程度,并对政策应用加以评估。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广泛实践始于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对这一理论的认识经历了由浅至深的过程。阿根廷经济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学者们对拉美经济改革的深刻反思。

^① 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页。

对民族主义、民众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政治思潮的探讨是拉美政治研究的重点。民族主义研究通常与拉美的民族民主运动和政党政治相结合；民众主义研究早先更多地从政治现代化、民主化进程等视角出发，后来又扩展到社会福利、收入分配等领域；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一开始更关注共产主义运动，但随着“21世纪社会主义”的兴起，对这一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日益活跃。

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①和《拉丁美洲现代思潮》^②两部著作可以说是对拉美历史上各种理论思潮的全面梳理。前者更注重拉美文化的思想内涵，后者更系统地总结了拉美地区的各种“主义”。这两部成果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揭示了拉美的理论思潮与政治经济社会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2. 地区性研究与国别研究相辅相成

地区研究和区域研究有助于把握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整体特征，而国别研究更加注重每个国家的发展特性和差异性，两者缺一不可。从建所之初，拉美所学者就秉承“地区和国别两手抓、两不误”的原则，推出了一大批地区研究和国别研究的精品力作，形成了国内拉美学界最完整的学科研究平台和为数不多的国别研究专家团队。各学科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支撑，相互补充，共同勾画出整个拉美地区和各个国家的“全景图”，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知识和学术基础。

早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所学者就完成了有关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经济发展的国别著作。从1999年开始，包括20多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列国志》系列著作相继出版，打开了中国认识拉美的一扇大门。一些鲜受关注的国家也被纳入其中，弥补了以往成果中对中小国家研究不足的缺憾。此外，在每年出版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中，全面而翔实的国别报告都是一大亮点。

在学术研究方面，拉美所学者将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委内瑞拉、古巴等主要国家作为研究重点，兼顾其他中小国家。巴西的现代化进程和大国地位、墨西哥的政治模式和革命制度党的兴衰、阿根廷的经济危机、智利养老金制度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执政和发展困境、哥伦比亚的和平进程、古巴的社会主义道路等议题都得到了充分的讨论。

^① 索飒著：《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② 徐世澄主编：《拉丁美洲现代思潮》，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

3. 以史为鉴，服务现实

了解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虽然史学研究并非拉美所的主要研究领域，但学者们深知，几乎所有的发展问题研究都离不开对历史的了解和熟悉。对拉美经济发展模式和战略、现代化进程、政治民主化、社会结构、宗教文化等问题的研究，如果没有历史学的积累，很难作出客观准确的判断。因此，拉美所学者并没有摒弃对拉美历史的研习。《拉丁美洲史稿》（第三卷）、《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史》和《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等著作^①，以及《剑桥拉丁美洲史》《简明拉丁美洲史》《印卡王室述评》等译著^②，不仅是拉美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而且也为现实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学基础，成为拉美研究工作者的必读书目。另一方面，很多关于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史学基础之上的。拉美所学者通过对历史的分析和考察，或寻根溯源，或以史鉴今，既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底蕴，又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和透彻性。在研究过程中，拉美所学者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既强调殖民统治给拉美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也正视欧洲文明留下的历史遗产和深远影响；既认识到拉美发展过程中自身存在的脆弱性和依附性，也承认外部势力掠夺和压迫所造成的危害。

4. 广泛研究，深度思考

鉴于拉美地区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和特殊性，拉美所学者以更广阔的视角和专业深度来提升研究成果质量。从广度而言，研究主题从集中于拉美发展的基础理论和实践评价向比较研究和多元化维度扩散。拉美各学科着重研究了具有代表性的重大问题。政治领域包括政治思潮、左翼政党发展、国家政治制度、政党政治、国家可治理性等。经济领域包括经济发展理论与思潮、经济发展模式与战略、经济危机与改革、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社会文化领域包括城市化、收入分配与贫困问题、社会保障制度、文化研究等。国际关系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理论、拉美对外关系及外交政策、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拉美地区组织、拉美参与全球治理、中拉关系，等等。较有影响力的成果包

^① 李春辉、苏振兴、徐世澄主编：《拉丁美洲史稿》（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徐世澄主编：《美国和拉丁美洲关系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贺双荣主编：《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② [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1~9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2013年；[美] E. 布拉德福德·伯恩斯著，王宁坤译：《简明拉丁美洲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秘鲁] 印卡·加西拉索·德拉维加著，白凤森、杨衍永译：《印卡王室述评》，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

括《拉美发展模式研究》《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究》《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等。^①

从宽度而言，拉美所学者研究成果以期刊论文为主，主要发表在《拉丁美洲研究》《世界经济》《国外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自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研究地位上升，发表期刊种类呈现多元化趋势，由团队合作的集体成果逐渐增多。

从深度而言，拉美所学者从思想穿透力、方法适用性和观点原创性上深入阐述拉美国家面临的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例如，拉美所学者推动了利用交叉学科对具有明确主题的若干学术问题的研究，引起国内学界的热烈讨论。在城市化问题上，拉美所学者对拉美超前城市化形成普遍共识，并致力于为中国城市化路径提供借鉴与启示。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上，拉美所学者通过国别案例和国际经验比较，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经验教训^②。在中拉命运共同体问题上，一些学者对新时期深化中拉关系、扎实推进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方向和路径进行了全面分析^③。

五 新时代、新机遇、新要求

“十四五”时期中国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意味着需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面对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考验，中国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发挥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因此，中国高质量发展必将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而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不仅为中国拉美学术研究提供了新机遇，而且也给拉美学术研究提出了新要求。

（一）中国高质量发展必将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

中国高质量发展具有深刻内涵。具体而言，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中国

^① 江时学著：《拉美发展模式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袁东振、徐世澄著：《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苏振兴等著：《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中国社科院拉美所课题组：《拉美国家发展模式的变革与影响》，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2期。

^② 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载《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1期。

^③ 吴白乙主编：《面向新时代的中拉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新发展阶段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之相适应。当前，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这主要归功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懈奋斗所奠定的雄厚物质基础。例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又如，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站在新阶段的起点，中国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以体现出时代的鲜明特征——新发展阶段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大跨越。

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标、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实现新的发展目标，中国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从根本宗旨、问题导向和忧患意识三个方面把握新发展理念是新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当代中国在新发展阶段上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①因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以体现出系统性和全局性。

基于国际秩序变革和世界经济深度调整，中国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一项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这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国内大循环的根本保障，也是畅通国际循环的原动力；更高质量的国际循环反过来也将提升国内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效率，两者相辅相成。而且，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要在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下，增强生存力、竞争力、发展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519/c64094-28361550.html>. [2021-05-09]

力和持续力。这些都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发挥作用。

（二）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为拉美学术研究提供新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国内拉美学术研究提供了行动指南。拉美所从建立初期就在第三世界、现代化、转型等问题的研究上，奠定了扎实的研究基础，形成了良好的学术传承。经过60年不懈努力奋斗，拉美所已经从自发探索转向自觉构建新时期的拉美研究体系，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也将为此提供重要机遇。

首先，巩固学术体系，充分总结新理论和新实践。学术体系是构建“三大体系”的核心。新时期，拉美所将致力于系统化整合多领域的研究，既尊重和推动各学科领域的专业化发展，形成有特色的学术传统；又能凝聚成全所的学术发展主线，围绕中国和世界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前沿问题，推进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在重大学术理论、重大前瞻性智库成果等方面实现突破。

其次，完善学科体系，深度体现系统性和专业性。学科体系是构建“三大体系”的基础。一是仅仅抓住学科发展主线。具体而言，要深入研讨学科发展的总体趋势、内在逻辑和有机联系，认真分析现有研究基础、弱项和优势，明确努力方向，凝聚研究力量，确立拉美学科发展主线。二是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的拉美学科教材体系。三是提升拉美研究人才体系的竞争力，通过团队研究推动学科人才的集体成长；与此同时，通过人才引进和培养的学科平衡性，促进形成合理的人才梯队储备。

最后，构建话语体系，大力增强学术研究影响力。话语体系是构建“三大体系”的平台。拉美所将致力于对内体现学科在国内的学术引领地位，对外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及中国经验的理念、主张和方案。鉴于此，新时期拉美所将通过打造具有品牌效应的学科重大成果、搭建多元化的宣传和对话平台、拓展国内外拉美研究学术网络，以显著提升中国拉美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三）伟大实践和社会科学大发展为拉美学术研究提出新要求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站在新阶段的起点，拉美所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基于中国高质量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新要求，从研究框架、学术活力和中国特质三个方面开创拉美学术研究新局面。

1. 巩固历史与逻辑、现实和理论相统一的学术研究框架

具体而言，一要充分认识到历史研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增加拉美学术研究的历史厚重感。二要从现实角度出发建立内外因素相结合的分析框架。既要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聚焦拉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等的不同表现，又要着重考察现实条件下拉美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互动关系。三要基于理论和逻辑视角解决学科定位和发展的问題，以学理构造为核心，注重理论传承与创新。

2. 激发问题导向与推动方法论创新的学术研究活力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新阶段拉美研究关注的重大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拉美政治生态的新变化及其影响，中拉生态文明对话研究，拉美经济长期发展与循环格局研究，世界变局与自主发展道路，拉美的经验与教训，区域治理观、大国竞争与中拉关系，中拉共建“一带一路”研究，高质量发展研究，中拉经济开放比较研究，发展与安全的拉美案例研究，新时期拉美国家社会冲突研究，等等。

推动方法论创新是保持学术研究活力的重要来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很广，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拉美学术研究都可以研究借鉴，但不能失去科学判断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①

3.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的学术研究体系

哲学社会科学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②一方面，拉美学术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视角、中国利益和中国道路为出发点，着重对

^{①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519/c64094-28361550.html>. [2021-05-09]

拉美发展相关问题与中拉关系问题开展研究。另一方面，要通过拉美学术研究为解决中国重大现实问题和服务于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智力支持。在新时代新阶段，拉美所学者将为构建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拉美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继续不懈努力。

六 开拓创新，不负使命

建所60年来，拉美所前辈学者的学术耕耘不仅为中国拉美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也为国家发展、外交决策、企业出海提供了智力支持。拉美所迎来甲子华诞之时，也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和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站在新征程的起点上，拉美研究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也肩负更大的新责任。为此，拉美所必须秉持1961年建所时国家领导人赋予的初心使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

第一，坚守责任，不负使命。拉丁美洲研究所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并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成立的。毫无疑问，党和国家赋予拉美所的身份就是中国拉美研究的“国家队”。身份决定使命和责任。站在新的历史节点，拉美所须强化“国家队”意识，提升“国家队”能力，凝聚“国家队”人才，推出“国家队”成果，展现“国家队”水平。作为中国拉美研究的“国家队”，拉美所不仅要继续担当中国拉美研究队伍的“主力军”和“人才孵化器”，而且更要成为拉美研究成果的“主产区”和“优产区”，引领中国的拉美研究，代表中国的拉美学界与国际同行对话，在国际拉美学界充分展示中国视角，传播中国声音。

第二，把握机遇，迎接挑战。60年来，前辈学者为拉美所的发展夯实了基础。现阶段，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拉关系也处在历史上最好阶段，拉美研究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注，这些都为中国拉美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源、更广阔的空间。与此同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给中国的国家发展和国际战略提出了许多亟待回答的研究问题，这为包括拉美研究在内的国际问题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家和社会对基础和应用研究更趋专业化、多元化和精细化。为此，拉美所将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判断、重要思想、重大任务，推进拉美研究从“供给侧”向“需求侧”的适当转型，将学科发展与党和国家的需要有机结合，贴近战略需求、政策需求、市场需求，努力实现研究问题和领域与多样化需求之间的有效对接，履行好新时代赋予中国拉美研究“国家队”的

新使命。

第三，突出重点、质量导向。经过 60 年的勤恳耕耘，拉美所基本实现了对拉美国别、领域、问题的全面覆盖，并且推出了一系列学术精品。继往开来，创新、超越是拉美所科研工作未来发展的核心理念。在学术创新方面，我们在继承前辈学者优良学术积累和传统的同时，也要勇于在理论解释、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方面开拓创新，在研究工作中增强理论性、前瞻性和战略性意识，进一步提高思想穿透力，提高研究的学术增量和影响力。着眼未来的拉美研究，做好以下两个方面工作尤为重要。其一，从理论逻辑上，解决学科定位的问题，聚焦于发展研究。在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社会文化学等各学科领域，充分认识理论探索对于认识社会科学现象和从现象中寻找本质联系的意义，以学理构建为核心，注重理论传承与创新，注重研究工具方法的应用，深入研究世界特别是拉美发展理论、经验与教训，加强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发展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发展实践。其二，从历史逻辑上，包括历史学派和历史研究方法等，以研究对象为坐标，充分认识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特殊性的重要意义，注重拉美现象特征、行为模式、演变趋势等方面的描述与考察，深入把握分析拉美的独特性、差异性及其对于中拉关系的借鉴作用，加强拉美基础研究建设，为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区域治理实践作出智力贡献。

第四，开拓创新，再创辉煌。着眼未来，拉美所将秉持党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战略部署，根据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国社科院建设“三大体系”和“三个定位”的要求，胸怀两个大局，坚持中国立场，结合世界视野，紧紧围绕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重大问题和紧迫问题，深入研究中国改革与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学科发展主线和学科发展重点，增强前瞻性和战略性，在学术研究、推广、传播、应用等各个环节落实推进，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上扬长补短，争取实现拉美研究在学科建设及智库建设上的全面性、系统性、高质量的发展和繁荣。同时，进一步完善国际学术交流机制，促进与全球拉美研究网络的对接与深度合作，扩大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求真务实，奋力开拓对拉学术合作、学术外交的新局面。

（责任编辑 刘维广）